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在「世界書局」遇上「共存大師」：評儂曦《論思想的交易：書本與書店》

An Encounter with the "Master of Being-with" While Browsing at the Global Bookshop: A Review of Jean-Luc Nancy's "On the Commerce of Thinking: Of Books and Bookstores"

doi:10.6752/JCS.201209_(15).0028

文化研究, (15), 2012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5), 2012

作者/Author：陳克倫(Ko-Lun Chen);蘇哲安(Jon Solomon)

頁數/Page：498-51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9_\(15\).0028](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9_(15).002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書評

《文化研究》第十五期（2012年秋季）：498-515

在「世界書局」遇上「共存大師」： 評儂曦《論思想的交易：書本與書店》

An Encounter With the “Master of Being-with” While Browsing at The Global Bookshop: A Review of Jean-Luc Nancy’s *On the Commerce of Thinking: Of Books and Bookstores*

蘇哲安

Jon Solomon

陳克倫、蘇哲安 翻譯

Ko-Lun Chen and Jon Solomon

Nancy, Jean-Luc. 2008. *On the Commerce of Thinking: Of Books and Bookstores* (*Sur le commerce des pensées: Du livre et de la librairie*, 2005), translated by David Will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8232-3036-5, 59 pp.

在思考書本之際，超越日常概念下的二元結構到底有沒有可能？此二元結構包括：內容相對於形式、物質性商品相對於非物質性觀念、作者相對於讀者等等。換言之，在此二元性中，書本不是作為超驗性符徵的具體實現（「道成肉身」），就是作為契約性（溝通與交易）關係的具體實例，是否可能跳脫書本作為以上任一束縛自主主體的概念呢？不消說，這兩項選擇都建立了共同體的固有模式。如同尚呂克·儂曦(Jean-Luc Nancy, 1940-)的英譯者大衛·威爾斯(David Wills)對讀者的建議：「何謂共同體？」這個問題貫穿儂曦的全部著作，「甚至這個問題在其著作當中相當於一項宏大的哲學計畫」，同樣也推動本著作的思路。然而，這個根本的問題在這本書當中的處理頗不如儂曦的其他主要著作一般地嚴謹，因而產生了對於解構派以及我們所處之時代——這是一個書本的社會常規再次經歷著像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所代表那樣根本性改變的時代——的一些令人困擾的問題。

在《論思想的交易：書本與書店》（*On the Commerce of Thinking: Of Books and Bookstores*，後文簡稱《交易》）的表面上，它持續經典的解構方式，將本書作為一種玩弄「外在與內在介面」（interface between outside and inside）(1)的形態。換言之，我們作為讀者就被邀請參與一場文本的攤展，此攤展仔細地制止各種二元對立，以防被轉換成辯證法可以輕易動員的原料，或被納入原初性以及派生來源的階序當中。然而，就如同我們被告誡不可用封面來評斷一本書，《交易》的解構性「面子」（face）遮蔽著某些手法，進而迫使我們重新評價文本的解構意義。這些關切首先呈現在「何謂一本書？」這個問題的啓始定義。一開始，儂曦引介了「書本的『純粹觀念』」（the “pure idea of ‘book’”）(3)的見解，此一公式在通篇其餘章節當中被精確地重覆。對於本讀者來說，儂曦如此訴諸純粹性的概念，即使是關於對我來說如此重要的東西——書本，也不禁令人產生相當突兀乃至不適的感受。難道解構派所屬的20世紀差異哲學，不正應當關切展現純粹性當中的不純，中心的邊緣，以及在封閉中的開放嗎？60、70以及80年代多數的解構派著作的標準開場白或招手策略，其實就是針對那些由於歷史實踐所積累出來的封閉性加以打開的動作。在儂曦關切共在之存有論構造與主權之根本問題的精心傑作《解構共同體》（*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當中，那樣的封閉性主要反映在以諸如主權、身分認同與本質等等概念來界定共存的政治理念。不消說，戰後的法蘭西解構派針對封閉之觀念的討論，受惠於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且同時與海德格進行一場徵候性地對西方形上學之封閉的概念的批判式對話。然而，相較於如今足以稱之為解構學的「經典」動作——藉由加法（addition）或乘法（multiplication）的置換效應來揭示一個開放點（德希達著名地稱之為「散播」〔dissemination〕與「延異」〔différance〕），《交易》一書以一系列的減法動作來定義書本。我們首先被告知書本所不是的，它不是「書信、傳記或是諷刺文」（letter, memoir, or lampoon）(2)，亦非一堂「課程」（lesson）(4)、一本「手冊」（manual）(4)、一篇「技術論文」（treatise）(5)、一種「媒體」（medium）(14)、一套「冊籍」（volume）(6)，甚至並非一部「作品」（work）(5)。儂曦寫道：「書本

完全是別的東西。」(5) 此它物不能被對象化：「此處必須作為我們所關切的書本不能被等同於一個得以區別的對象或是諸多對象的一個被定義的種類。」(6) 當儂曦宣告此刻討論的正是「作為絕對性的書本」(absolute as book)且還這般地難以辨讀(illegible)(27)時，我們不禁懷疑，解構派曾經經常被貼上、不盡公允的標籤——「否定性神學」(negative theology；參見Coward and Foshay eds. 1992)，是否就此終究找到了一個頗具說服力的據點，足以驗證他人對解構主義持有這樣深刻的印象？造成「印象」(impression)(13)正是儂曦歸結書本的本質之一。然而，《交易》一書究竟「印」出了什麼形象呢？

《交易》一開始便以表意鏈(signifying chain)在法語中的散播效果對此問題提出回答：透過同音異義字而非嚴格的字源學，將「書」(livre)與「繳交」(livrer)之義聯繫在一起：「書本繳交」。(un livre livre)(8)書本的本質性特質在於向人發話(address)的形式之中。書本與其說是傳遞一個觀念或繳交什麼具體內容物，不如說是建立一種主體之間的關係：「書本說話並不是有關什麼，而是向誰。」(The book doesn't speak of, it speaks to)(12)根據語言的解構式理解，發話不同於溝通的區隔在於：「發話標示出一種關係，在本性上是展演性的，不依賴『我們』是否真的交換了同樣的訊息。」(address designates a relation, which is performative in nature, independent of whether or not "we" actually communicate the same information)(Sakai 1997: 4)與溝通內容無關，發話為語言之事件命名了語言發生的事實（對此一現象，科學依舊無法提出解釋）。因此，書本在儂曦理解的意義下是一場揭露而得以觀看存有論之本質條件的事件，這是儂曦在別處所指的「共通普及—存有」(being-in-common)或「向—存有」(being to)的狀態。這是要比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更為基進的一種分享的條件，因為它先於任何原初性分裂以及任何原初性自我。儂曦並非終將共通普及—存有(being-in-common)指涉於個體性的一端。事實上，在如此的思想當中，個體其實是無法設想的，除非將它在存有的溝通過程中（而不是團契中）的微分位置納入進來。特異性(singularity)與其說自行成為單個點，爾後就跟其他類似的單個性之間開始互動起來，不

如說，除非作為分享的特異性（並非個體性或同一性 / 身分）才能存在。這是說，此特異性「透過分享而建構其自身」(are themselves constituted by sharing out)，「透過分享，而被分配、放置，或毋寧說是間隔開來，進以使其成為他者。」(are distributed and placed, or rather spaced, by the sharing out that makes them others, Nancy 1991: 25)在《交易》當中，儂曦以「對話」為名來歸結此一關係：凡是書本的特殊對話性特質（這是說，每一本書成為純粹的大寫書本的資格）正是儂曦所指的「聲音，一種不可約減的口語性。」(voice, an irreducible orality)(13)眾所皆知，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透過批判口語性被認為先於書寫文本而展開他的學術生涯，德希達著名地將此一觀念標示為「語音中心主義」(phonocentrism)。然而，此處儂曦指涉的口語性並非意指像語音中心主義那樣的原初性，又是詞語的起源(source)，又是詞語同一性的最終歸屬與保障，而是指存在於所有「原始資料」(sources)裡的原初差異。《交易》一書憑藉著書本—交付(livre-livrer)的散播鏈，展開一場從無法對象化的關連性到聲音之特異性的思想歷程，其實就等於重演了儂曦早在1982年的文章〈聲音的分享〉(Le partage des voix)所強力鋪陳的對詮釋學的解構。在《交易》的第一頁，儂曦直接點出了其之前的著作：「書本真正的屬性若不是處在其建立且維持在介於開放與封閉的關係中的話，那便不存在。相比於格言般的門扇那樣可任意打開或關閉，書本就無法那樣：它總是介於兩者，總是從一個狀態通往另一個狀態。」(1-2)在其未定的特質當中，書本就呈現了〈聲音的分享〉一文的核心關懷——詮釋循環的問題。

如同德希達，儂曦大部分的著作展現出明顯的互文性與自我指涉的喜好，儘管亦或正是因為儂曦宣稱：「我通常忘記大部分我所寫的東西」(Nancy 1997: 1)《交易》可以被讀作是一本關於儂曦之其他書的書，其中總目(catalogue)的性質跟對話(dialogue)一樣多。當然，《交易》篇幅之短（且儂曦歷年的著作太多）不足以承攬詳細展論的負擔。有鑑於此，讀者一定會包容文本裡陸續登場的各種形形色色的總目。從諸如「柏拉圖(Plato)，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米爾

頓(John Milton)或盧坎(Marcus Annaeus Lucanus a.k.a. Lucan)，喬伊斯(James Joyce)或卡夫卡(Franz Kafka)」(23)等等著名作家系列，到諸如「《神曲》(*The Divine Comedy*)或《紅與白》(*Lucien Leuwen*)，《精神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或《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在地獄的一季》(*A Season in Hell*)或《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8)等等著名著作的名單，各式各樣的隨性條例式的總目單不時打斷行文並穿插登場。另外還有貫穿儂曦幾乎所有其他著作的慣用偏好——將名詞或形容詞串連在一種單一又眩目的文筆裝配當中，例如：「編織與裝訂的模式，紙張的品質——濃淡、厚度、顆粒——也屬於這種永續性，如同設計封面時，它的顏色、基調、有時是它的圖像、內外的印刷、字體的設計與大小、它的版面格式、構圖、頁首標題、扉頁、每種打字排印錯誤的校正……」(32-33)無疑，此處運作著一種展演性的遊戲，不僅是曾一時流行的說法——「文字之愉悅」(the joy of lex)，而是儂曦所提出之「每一個有限且在無限擴展中的集合」(33)的意義。這是在一種總目之形式當中的對話，也是一種對話之形式當中的總目。在此，當對話指向一種同時無限的分享且間斷(discontinuous)的存有論條件時，總目則指向集合的有限性。借用一種海德格所採取的姿態，且現在已成為一般解構派作家之間的共同潮流，我們也可以透過字源學的遊戲來強調總目與對話之間的關係：被拋出乃至記下的言說(*legein*)之所以成為完整(complete/*kata*)的意義，不是因為它本身具有某種詳盡充足的先天性，而是因為它必須在兩方(*dia-*)之間進行，否則根本就不可能。這就是為何自從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1966)以降，現代思想即使面對那些表面上必然作為獨白式的分類圖式也總是喜歡凸顯出其中的對話性主體之特質。如同瓦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所觀察：「如果圖書館的混亂有什麼相符之物，那就是總目的秩序。」(if there is a counterpart to the confusion of a library, it is in the order of its catalogue, Benjamin 1969: 60)然而，總目的秩序與對話的塵囂並非對立的。作為對話的總目（或者說，作為成雙一言說(*dia-logue*)的完整一言說(*cata-logue*)，《交易》一書不能理解為為了達到一個累積性目的的一種加法形式（例如，作家+讀者=

書本之意義的整體），而毋寧是應該理解為藉由除法分配的一種分享模式：「〔言說／邏各斯（the *logos*）〕聚集我們僅為分配我們。」（Nancy 1982: 84）分享／分配的經典解構性形式是中斷（*interruption*）、斷岔（*caesura*）、非一關係的關係（*the relation of non-relation*）。儂曦之著作的整體便致力於展現此非一關係性的「中介」（*in-between*）並非一種派生的或次要的條件，而是原初存有論的來源與本源——此一本源總是已經被差異所置換。

然而，如此非一關係性的中介落入例外性或關係被刪除掩飾的地方，正在於物質性突如其來的湧現：政治經濟學的勞動身體與人類人口的分種分類版圖。

政治經濟學：我們或許會問：接合書本（*livre*）之觀念與其繳交動作（*livrer*）之現實形式的同音異義字何不延伸為同時具有重量與價值衡量之義的「磅／鎊」（法文 *livre* 一字即是英鎊 *pound* 的傳統說法）？在《思想之分量／淨重》（法文原著 *Les poids d'une pensée* 英譯為《思想之重力／嚴肅性》*The Gravity of Thought*）一書當中，儂曦曾經針對另一組不同系列的詞語展開類似問題的相關討論。《交易》之所以錯過如此的可能性原因，或許是因為鎊（*livre*）這個字早已被擠出當代法文的常用詞彙之外。無論如何，一本名為「論思想之交易」的書，會令人期待它切入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與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1820-1895）（以及在其之後的阿圖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等人曾經試圖訴諸「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的架構來加以理解——而終究局部失敗的問題。從那樣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或許會傾向主張書本的商業面向（*commercial aspect*）——包括出版工業以及把諸如作者、讀者、編者、出版商與書商等等社會角色納入法律架構並加以規範化的種種社會實踐在內——以一種複雜的辯證方式最終決定了（*determines*）書中所溝通內容的社會意義（*social meaning*）。當然，解構學閱讀模式一定會展現「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這兩範疇的根本不穩定性，以及兩者在存有論層次上更為基本的相互疊合與滲透的真相：這就是決定論遇上差異哲學之際所產生出來無止境的延遲效應（故而持續要求著重新閱讀與重新詮釋）。在

《交易》一書當中，農曦拒絕以商品拜物的角度將書本的意義簡約為「意識型態」一事，可以視為解構式閱讀的一例：「那『拜物』的光輝（使用馬克思的詞語）並非總是或必然，甚至從未或幾乎不曾是其專屬的欺瞞性光澤，一種「消費」(consumption)的幻象（無論那個幻象的重要性與滲透程度有多麼重要，包括在書籍相關的領域之內）：原則上，它亦保留了某些其所產生之關於大寫觀念(Idea)的東西。」(34-35)農曦在十分謹慎地不排拒文化取決於生產關係的物質性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觀點的同時，還是堅持避免「下層建築最終決定論」變成一個用以理解其中相關的存有論關係的**專屬(exclusive)或壟斷式的(monopolistic)**方法論。書本所揭露的「大寫觀念」(Idea)不能同個別書籍所擁護之諸多具體主張混淆，而是一種關於存有論構造之本性的真理。此存有論條件不能被交換價值的邏輯補捉，它是「透過其生產之主體所構造在其自身當中之絕對價值下真正的非－可商議與非－可交換的價碼。」(34)農曦既不抵制商業兼溝通性關係本身，更不呼籲我們回返到形上學的價值來對抗喪失精神意義之物質主義（事實上，農曦《哲學的遺忘》(*L'oubli de la philosophie*, 1986)一書便致力於反駁在1980年代於法國、英國以及美國的文化反挫現象當中這般已然常見的動向)。農曦反而在溝通與交易的核心專注於喚起對一種存有論真理的關注，亦即我們的共通普及－存有之真理。「我們的思想的交流，無論它是如何地鬆散或拙劣，都依賴於一種通貨，其不可數的單位名為「書本」(book)。」(64)書本其「不可數」(incalculable)、「難以辨讀」(illegible)以及「對話性」(dialogical)的特質最終指向共同體的本性。書本並非只是共同體的產物，書本就是共同體，因為共同體正是由溝通與交易之微分差異的分享／分配所組成的。

然而，一旦有讀者開始仔細思考，在以交易(commerce)為組織原理的資本主義社會當中，共同體往往表現為分工體系時，這般精彩又重要的存有論真理就可能遭到回拒（這是令人遺憾的）。就在被告知「書商是一位超驗的讀者：她提供其顧客閱讀的可能性條件¹」

1 班雅明觀察到，即便在20世紀一開始的時候，總目的角色就已然使得經銷

(36)的後兩頁，我們第二次在文本中被提醒到「書僮」(Librarius)這個角色的存在：他在古希臘是柏拉圖與其他人委任其大聲朗誦或抄印書本且維持圖書館良好秩序的「受過教育的奴隸」。(38)顯然，在閱讀的可能性條件當中，存在著不同的社會位階。在一切的書本，甚至是那些具純粹性的書本當中，或許存在著相較於詮釋循環，而更近似於「時而打開，時而關閉」的「門扇」(proverbial door)(2)要素。《交易》一開始對書本的減法性定義，如今回過頭來糾纏著我們的共通普及—存有的存有論真理，使得本次《交易》一書易於遭受如下的指責：它轉移了對於社會分工的關注，儘管社會分工往往以減法性的視野來界定並維持識字、書寫與閱讀能力的社會界線。如今資訊科技這麼發達，透過電子工具傳播文本的資訊技術僅會擴大此分配/區分(division)——變成所謂的「數位分歧」(digital divide)——而不是把它加以減少或消除。因此，當儂曦在同一頁的下段告訴我們：「書店是香水店、燒肉店，糕餅店」時(38)，倘若不正是因為對書籍抱有拜物性癖好的話，否則讀者就不可能加入欣賞這般列舉書店的絕妙特質所形成的高度美學化總目，而不去思索被排除在外的其他總目。例如，諸如非法移工以及不識字的血汗工廠勞工，他們大部分沒有發聲的管道，僅僅存在著以生命換取逃離的機會的選擇。上述儂曦以糕餅店(*patisserie*)一詞來結束關於書店的總目系列，這是一個特別令人遺憾的選擇，令人想起在大革命前夕常被誤咎於法國皇后的言詞：「讓他們吃蛋糕呀！」(*Qu'ils mangent de la brioche!*) 解構派從未令人滿意地回答在1981年首次有關德希達的瑟希茲會議(Cérisy conference)中，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 1942-)以她著名的報告針對德希達著作所提出關於政治經濟學之文本的問題(Spivak 1988)。而從《交易》這本書的內容來判斷，儂曦晚近的著作其實並未改正那樣的趨勢。

令人不禁思量「受過教育的奴隸」作為一名分工體系的代表，

商的角色相形失色（「並非所有重要的採購都在經銷商的營業場所發生。總目扮演了更重要的部分」〔*Illuminations*: 63〕）。班雅明如此的觀察要求我們去質問：內在性共同體的「可能性之超驗性條件」在何種程度上不是先行建構在知識主體展開決定的位置上？

在《交易》當中是個從事編目活動的主體且被排除在對話之外（除了重複且複製他人的詞語），其實應當針對其作為現代國家知識分子的縮影而更受關注。儂曦並沒有花任何顯著的篇幅討論此形象，但他對於書本之減法性定義的評論是具啟發性的。從這些評論當中，我們學到一本書應當與手冊與技術論文區分開來，這兩者都構成了「作品 / 工作。」(works)(5)作品 / 工作均屬於目的與手段的務實領域，並且構成「操作」(operations)的條件。熟悉《解構共同體》的讀者將輕易地辨識出「操作性」(operativity)為思索共同體之意義所帶來的問題：「共同體不是融合的計畫，亦非在一般方面上，一種生產性或操作性的計畫，甚至完全不是一個計畫(project)。」(Nancy 1991: 15)然而，操作性自身巧妙地逐漸滲透在書本的生產過程當中，正是因為它是一個牽涉到生產之社會關係的問題。儂曦指出，那些從事這種特殊形式生產的人之主體性，其實是分裂的。一方面，它被導向（一種確定內容的）「溝通」(communication)活動，但另一方面，它依舊「外於且異於此一傳播。」(10)我們或許可以說，它被分配在溝通的封閉循環與發話(address)的開放循環之間。在儂曦針對體制內的知識生產展開那樣的區隔之後，他還指出那樣的曖昧性其實就是柏拉圖之所以要排斥（並驅逐）吟遊詩人的主要理由——因為吟遊詩人只會背誦他人的詞語而不解詞語之真義。儂曦挖苦地評論道，柏拉圖如此貶低吟遊詩人的原因其實出自於他自身的焦慮：「事實上，他在為自己感到焦慮，在為他自己對於那些他正要以背誦的方式忠實傳遞卻究竟理解多少的真理感到焦慮。」(10)正是在如此面對論述對真理之忠誠度的焦慮當中（那種焦慮勢必誤了真理），柏拉圖切入共通普及一存有之書寫的途徑不僅是經由抽象的「書本」，而更是經由書本的具體「閱讀是來自一位被任命去圖書館取冊的奴隸」(11)才被刻印於社會秩序當中。書僮同吟遊詩人均分享了根本的相似性，而柏拉圖之所以想將他們排除在理想國的門之外，抑或囚禁在圖書館的門之內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同樣都致力於他人詞語的重複卻不了解其中「真正」的意義。柏拉圖在此想要禁止在「門外」的吟遊詩人，反而變成了在彼想要囚禁在「門內」的書僮。如此理解書僮其實就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1942-)，在一本論及主權性，與儂曦形成一場針

對現代共同體之存有論建構進行對話的標誌性著作當中，稱之為「包含性的排除」(inclusive exclusion, Agamben 1998: 21)的現象。已然在吟遊詩人身上被禁止的，反而在書僮身上重新浮出檯面。無庸置疑，透過奴隸的形式來包裝此一包含性的排除，柏拉圖曾經寄望於一種雛形的主—奴辯證法，以期將「包含性的排除」當中的不確定性加以安全隔離。值得注意的是，被禁止的吟遊詩人轉變為被包含而馴服的奴隸(the banned-bard-turned-included-slave)，它被賦予管理圖書館的任務——也就是說，對「真理」知識進行編目整理與複製傳遞的工作。此真理雖然是一種社會性的真理，但是潛藏其中的對話性反而被轉換為知者與不知者的區分，後者就是那些以雙手而非大腦來勞動的人，換言之，就是與書本之關係局限於手冊(manuals)的人（透過字源學，儂曦為我們指出「手冊」的定義便涉及手作勞動〔manual labor〕）(5)。藉由這般對儂曦的閱讀，我並非試圖指出分工的問題將比共通普及—存有的存有論建構具有什麼更大的優先性。更確切地說，我試圖指出，如同儂曦在此嘗試展開關於書本之共同體的論述——作為書本的共同體且作為共同體的書本——反而需要更仔細地遵守儂曦自己的訓令：「在此沒有任何『觀念性』(ideality)與『物質性』(materiality)之分離，更不能有『觀念』(idea)與『身體』(body)的分離。」(9)然而，以上訓令到了某一個時候似乎就被拋出腦後，導致《交易》一書親手創造了充分的條件致使自己意外落為一本自己所貶低的「手冊」之類的書籍，而非一本真正「純粹」的善本。有鑑於此，《交易》的減法性邏輯便不可避免地複製了分工體制。於是，《交易》不再作為一本「關於」(about)共通普及—存有的書，而是成為一本關於哲學性例外(philosophical exception)的手冊：一種知識的具象主體，授予或擅自賦予其自身，將自身視為分離於其透過觀察與操弄而建構之客體之外的權力。

或許有人會質問，《交易》一書對共同體的展論之所以最終陷入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的主因還不就是這種「哲學性例外論」(philosophical exceptionalism)所造成的必然後果嗎？在本書的第四章（本書分作十個小章節，旁錄一篇譯者的前言以及一篇獨立出來討論

數位文化的文章），以〈書本之人民〉(The people of book)為標題，《交易》提出西方與其他世界文化的區別正是在於書本與共同體的真理之間的關係。西方是將自身標示為「大寫書本之人民」(*people of the Book*)(16)的文化，因此賦予自身一種「閱讀之誡」(the commandment to read)。對書本之人民來說，「意義」(sense)不是「給定的」(a given)，沒有任何原初性的「聲望與大義，尺度與權威。」(24)「對我們來說，沒有意義是給定的，取而代之是閱讀之誡，它並非為了發現被隱瞞或拒絕給予我們的意義，而是為了以一種全然不同的模式進入一個大寫觀念的空間，那無非是給定意義之缺席之真實與本質的大寫形式。」(25)相對地，世界上其他的人民在各種意義上都獲得了一種被確定給出而全然在場的意義。「存在於一個一致且完整的世界，伴隨其諸神與諸權力的本性，那些意義被給定的人們是頌歌、碑文、象形文字或印記的人民。」(24)這些段落呼應著儂曦在《解一封：基督教的解構》(*Dis-enclosure: the D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ity*, 2008，後文簡稱《解一封》)一書當中長篇討論的內容：西方一神教自身包含了根本的解構性契機，而這一解構契機才足以提供寶貴的資源破除全球化可悲又虛無的歷史境遇。這歷史境遇的特徵在於民族國家與主權性這些一神性的現代政治形式，與資本主義交換價值的商品形式，均高度交織在一起。令人意外，儂曦這種有關基督教的詮釋將使得西方在其表面最為同一性的面向（換言之，那就是排除基督教以外曾經流傳於「西方人民」中的各種其他宗教信仰的面向）居然呈現著解構與差異的縮影。雖然作者對辯證合論的摒棄的確可以視為對黑格爾主義歷史觀的拒斥，但是《解一封》一書的整體意義實在太過接近傳統辯證式之西方中心主義的基本論調。這種論述最精闢的總結與典範就呈現於保羅·瓦樂希(Paul Valéry, 1871-1945)1919年的時事評論——〈精神之危機〉(*Crise de l'esprit*)一文當中的黑格爾式歷史觀：根據瓦樂希，西方作為西方並非因於某些確定特徵匯集在一起所形塑的同一性/身分，而是在於其主體建構過程的結構，確保了「西方」這個主體永遠站在最大值化的位置上。該結構的核心運動就是自我超克：這是透過自我否定與合論性更新的進程而追求同一性/身分之外的永續更新。在儂曦進行解構性閱讀的更新版本當中，西方作為西方正是因為它是

世界上唯一在時間攤展中展開解構的文化。有朝一日，我十分期待撰寫一篇專論，詳細討論受海德格啟發的解構派與歐洲中心主義之歷史性修辭之間的複雜關係，這些諸如「西方」(the West)、「我們的文化」(our culture)、「傳統」(the tradition)等等修辭貫穿著儂曦、德希達與拉古·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 1940-2007)這些20世紀法蘭西哲學家的著作。在本篇書評的脈絡下，我僅能概述幾點商榷的意見，冀望它們可以勾勒出我在別處已展開過的一種閱讀策略，那就是利用作者自身之哲學的工具來超越作者自身之文本的歐洲中心主義之局限。

我想提出的第一點商榷意見是關於《交易》一書中對兩種「人民」的區隔，亦即那個意義並非給定的書本之人民，與那個意義是「一致與完整」(consistent and complete)的人民（「頌歌、碑文、象形文字或印記的人民」）之間的區分。此區分令人想起酒井直樹(Naoki Sakai, 1946-)與羅勃特·楊恩(Robert Young, 1950-)所說的「西方的自戀性格」，基於此所有的他者都被本質地理解為「相較於西方的假定性中心，以對稱反差的方式所呈現出來的同質性差異。」(Sakai 1997: 70)在《解一封》當中，儂曦所展開的區隔至少更加細膩。首先，他謹慎地將伊斯蘭教包含到西方文化當中。其次，西方的定義源自於儂曦拒絕稱為「西方的」(occidental)的古代世界（古代希臘）與「基督教西方」(Christian occident)之間所發生的歷史斷裂。此斷裂的決定性時刻正是在於一種朝向與自我之關係的出現，它形塑了現代西方之主體性的基礎。(Nancy 2008: 38)唯有偕同此自我內省性關係的出現，作為主體的「歐洲」(Europe)以及之後的「西方」(the West)才會如此地現身。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決定著西方的定義的關鍵時刻的特點本來就是現代性的核心招數。基於此種同質性的同一性／身分透過例外論而形塑自身，同時否認其自身的「內在」(internal)差異，以及同被視為西方之「外」(outside)的區域之間的建構關係——這兩者都被用於提供「西方文化」(Western culture)在其「發展」（其實是佔奪）的道路上所有物質與非物質的重要資源的來源。儂曦如此欣然接受一神論相對於其他宗教文化的傳教主張一事，

實在缺乏說服力，尤其在面對西方以「外」的其他帝國那樣重視識字能力作為「真理」與社會權威依據的標準時。試想宋代的學院、圖書館、文本生產與檔案管理的詳盡系統：難道那個年代的程朱儒學體制當中「閱讀之誠」有亞於聖奧古斯丁時代基督教教條體制的地方嗎？

然而，農曦如何能了解儒家思想呢？提出這個問題並非為了捍衛學科以及／或族群的純粹性，而是點出存有論構造與知識的社會建構之間的連接。我們知道除了古希臘文之外，農曦自己無法直接閱讀任何非西方語言的文本（我遵守農曦意指的區分：古代希臘應該同「西方」區分開來）；他唯一得以歸咎於非西方人民與文本的方法就是透過在所有的建制化形式中具有歷史積累的翻譯媒介，這至少包含了後殖民時代中控管本國研究與區域研究之間的區隔且非常具問題性的翻譯體制。在後殖民地進行的本國研究與在後帝國中心進行的區域研究之間有多少是根植於農曦《解構共同體》一書指認為「內在主義」(immanentism)之預設而列舉的主體性之形式進行的呢？這個問題我們在此僅能點出來而已。然而，《解構共同體》的確提出了兩條令人信服的論證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人文知識的意義：首先，在現代性的脈絡中，共同體被誤解為一種內在性的自我生產（因而造成如同「何謂法蘭西？」這般問題才會成為政治性的基礎，甚至成為現代政治唯一具正當性的標準）；其次，主權性作為一種相對應於以上這個存有論謬誤的政治形式，跟絕對（客觀性）知識的企圖直接相關。有鑑於這兩條原則，我們就可以十分合理地推斷，倘若設想存有論構造產生變化的話，那麼這個變化就會連同帶來對知識的理解的相當改變，進而導向我們對於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產生一系列截然不同的新知識與新的版圖。確實，這依舊是一個迫切的問題，就如同酒井直樹在一篇名為〈日本思想的問題〉的論文中那樣指出，研究對象的掌握遠遠不如主體建構來得重要：「日本思想史非常需要質疑，『日本』是如何被建構，以及支撐著這個學術領域之對『日本思想』的欲求(the desire for "Japanese thought")是如何被召喚運用。」(Sakai 1997: 71)殖民關係持續存在於知識生產的主體性以及各種社會位置當中，即使是「後殖」時代的今天也依舊迫切需要批判。農曦在此議題上的沉默其實訴說了一種被動的共謀性，這相當類似於「在各自同一性／身分之相互轉移

建構過程中，西方與日本之間〔所存在〕的幫凶關係；基於此幫凶關係，對西方的偏執〔如同酒井根據楊恩所說的『西方的自戀性格』〕就足以喚起給日本人專用的自我指涉性。」(ibid.)

這將我們帶向《交易》的另一重要問題：在一本致力於書本、交流、溝通與共同體之間的關係的著作中，翻譯這個主題的缺席非常顯著。衆所周知，將存有論組成過程與交換價值混淆在一起即是現代性的標誌與重要癥結，而這個現象呈現最清楚的地方，莫過現代性對翻譯的理解中，把意義的產生過程硬塞於對稱交換的預設架構之中。翻譯的現代理解正是在一般性等價的基礎上設想文化的整體性及其「交流」的可能性。然而，即便我們將此問題擱置一旁，還是會依舊期待翻譯這個主題至少會出現在《交易》一書的開頭有關「書本之大寫觀念」(Idea of book)的定義討論中。這特別令人想起瓦特·班雅明對偉大著作的定義。對班雅明來說，一部作品成為真正偉大的著作的唯一途徑就是透過翻譯。在此，偉大著作是藉由其可譯性(*translatability*)的內在傾向而被定義的。根據班雅明的理解，「可譯性」並非關於等價的潛力，而是關於其對「純粹語言」(*pure language*)的投注，如同儂曦的共通普及—存有，可譯性所瞄準的「完整性」有別於那個在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之間的辯證運動中被拼湊出來的「合論」。藉由將一段後續生命贈與著作，翻譯給予了原著其最初所缺乏的某物——後續生命，並且因此呈現出一切本源不完整且延遲的悖論原貌。

相較於班雅明對偉大著作的加法性且乘法性的定義，儂曦的書本之純粹大寫觀念的減法性概念使我們懷疑，是否其共通普及—存有的絕妙觀念反而被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主義或文明論所出賣？在《交易》一書裡讀者所遇到的一切各種著作與作者的總目中，西方之外的著作或作家全然沒有一席之地。絲綢雖然被列舉為書寫文本的早期形式之一(19)，可是其東方的起源完全被忽視。存在於《交易》中的非西方文本猶如史碧娃克所拿來描述殖民關係的形象那樣，僅存為被重寫覆蓋的底本(*palimpsest*)而已。

儘管這些疏忽，假設我們把對於專門闡明共通普及—存有的哲學家—儂曦的期待降低到只要求公平代表原則即可的程度，那也實在

太過愚蠢了吧！這並非是一次呼籲作者加強本書之總目 (*catalogue*) 的數量與範圍，而是一次呼籲作者以對話 (*dialogue*) 的觀念來重新投注於共同體的願景。這或許是這次《交易》最令我感到失望的地方。即使我事先知道了，農曦這位令人欽佩，難能可貴的哲學家，由於學科與語言的局限而完全無法針對共通普及—存有的狀態展開同時兼顧發話與溝通活動一事，我還是難免感到些許失望。確實無法期待一人去達成所有的任務。然而，我們還是可以且應當希冀名符其實的「向—存有大師」應該會考量到其讀者的共同體，把他們的主體性納入進來而不僅是加以對象化。畢竟，很可能閱讀《交易》一書的讀者最多不是來自於原版的法文社群，而是集結在英譯本廣大的流通範圍內。《文化研究》編輯群的朋友雖然非常清楚我可以處理專業法文，但他們選擇給我英譯版以供書評一事，除了方便這個理由之外還可以說明這樣的一種事實：畢竟，恰恰是在翻譯關係的脈絡中，如同《交易》這樣的著作才會達到最大的全球效應。

必要的線索或要素其實早已存在於農曦自己的書寫當中。形構共通普及(*the common*)之基礎的「向—存有」(*being-to*)之「向」(*to*)，亦可加以時間化成為即將到來之物，亦即未來。如同農曦在其討論共同體的文章中一段對喬治·巴岱伊(*George Baraille, 1897-1962*)之書寫的引述：「書寫一本書的理由可以溯及改造一個人與其共存者之間的既存關係的欲望。」(*Nancy 1991: 41*)倘若如此，那麼每一次的書寫作為一次朝向性的書寫(*a writing to*)，其實也是一次朝向創造的書寫(*a writing to create*)，而所「創造」出來的，就是一種嶄新的主體。如同我現在的書寫一般，不僅是朝向「讀者」而書寫，也是朝向可能會被此書寫召來並佔領某種新發明的主體性的人們——**將來的人民諸衆**。在那個意義下，我們都是「書本之人民」。然而，我們前往該書的通道以及同其閱讀與書寫的參與，不可避免地取決於權力與知識的不均分配，而這往往是透過諸如官方語言與翻譯制度等現代語言的裝置來達成。

將來的人民諸衆？就是為了向那些讀者發話，其實就是為了把她們的主體性召喚出來，我才會想要從事書寫。這是發話的另一面向，一次創造讀者之共同體的呼籲，它尚未存在，但卻是現存共同體當中

那個用以抵抗共同體被主權性所收編的部分。「一個沒有共同體的共同體是傾向將來的(*to come*)，意即在每一次集體性的核心處，它向來總是持續地來臨(*coming*)（由於它不曾停止地到來，它便如同抵抗個體性一般不間斷地抵抗著集體性自身）。」(Nancy 1991: 71)當然，發話本身正因為無「身」可言（發話僅是一種關係，一種事件），所以就無力獨「身」完成這項任務，它必須依附特定訊息的溝通活動方能展開。「書本不單是，或根本就不是，溝通的支撐或工具……它不是一種媒體。」(51)

除卻「將來的人民」這個有關你我之間共處關係的面向之外，有關書本的其他一切都僅是虛榮而已，書本所意味的「後續生命」的社會意義頂多僅是紀念碑般的功能罷了。就像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1818年的著名詩作〈奧茲曼迪斯〉那樣，紀念碑式的社會制度，無論是宮殿雕塑還是經典著作，終究就是一種諷刺而已，是一次對人類的根本脆弱與有限性的驕然見證。

如今我們站在一次重大的歷史轉折點上，而這個變革，還是說這個革命，在書本上的反映便在於實體書店漸漸被網路書商所取代，紙本漸漸被平板電腦與電子書所取代。然而，這顯然不僅是一種硬體上的改變。儂曦對於虛擬書本之轉型的意義並沒有深入討論；《交易》一書中最後一章——〈電子副刊〉僅有的那幾段討論，遠遠不足以處理箇中的問題。有趣的是，該章節最後一段文字沒有標點符號，流為幾近意識流的書寫方式，似乎足以說明作者對共通普及一存有的期待依然未減：「這個不間斷的交易不是別的就是我們自己變為更多我們這些他者無價的交易彼此間交流或者我們大家變成蟲子畫素之一窩蜂的乳白液晶群……」(57)沒有標點符號的「我們這些他者」就好比沒有分種分類的社會組織一般美麗，只是，如同以上所討論，對分工體系等社會差異體制的省略，最後只會確保如此美麗的願景永遠淪為烏托邦般的童話故事而已。我們所期待的，不是省略版的童話故事，而是完整版的對話錄。而剛好在我最後完成本篇書評之際(2012)，近幾年延燒在網際網路各處的大規模混戰已經進入了短兵相接的激戰狀態：不久之前，一個名為library.nu的電子書籍共享網站遭到了關閉。

事件剛爆發之際，在衆多評語當中，最耐人尋味的回應來自印度的華裔法學研究者與開放原始碼倡導者兼反智慧財產權運動分子——勞倫斯·梁(Lawrence Liang)。梁比誰都清楚，「我們當然可以〔針對版權而言〕提出根植於數據與統計的反駁論點，甚至訴諸如同共享vs.私有(access vs. Pirvacy [sic.])之類的另類規範的基礎(counter-normative grounds)，可是現在都還是言之過早。對於我們這些視library.nu的關閉經過爲一種重大流失之肺腑經驗的人們來說，悼念期尚未結束。」(Liang 2012/02/19)以上這段話引人注目的地方在於作者對共同體的自覺反而壓倒了其他各種戰略上與技術性的考量。在諸如「資訊民主化」與「資料庫民主化」等等昔日的口號重新搬上檯面之際，農曦這位「共通普及—存有大師」正要提醒我們的，還不就是這點：書本即是一種諾言(promise)，「在我們之間頑固地被分享爲承諾僅此的交易本身。」(57)未來的人民諸衆，歡迎光臨世界書局！

引用書目

一、外文書目

-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 Benjamin, Walter. 1969.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 Coward, Harold and Tobay Foshay eds. 1992. *Derrida and Negative Theology*. Albany: SUNY.
- Nancy, Jean-Luc. 1982. *Le partage des voix*, translated by Gayle Ormiston. Paris: Galilée.
- . 1991.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Peter Connor et. 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 1997. *The Gravity of Thought*, translated by François Raffoul and Gregory Recco.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 2008. *Dis-Enclosure: The D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ity*, translated by Bettina Bergo, et. al.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Sakai, Naoki. 1997.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pivak, Gayatri. 1988. "Scattered Speculations on the Question of Value," in *In Other Worlds*, pp. 154-178.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二、網路資料

Liang, Lawrence (勞倫斯·梁). 2012/02/19. Library.nu R.I.P. <http://kafila.org/2012/02/19/library-nu-r-i-p>.